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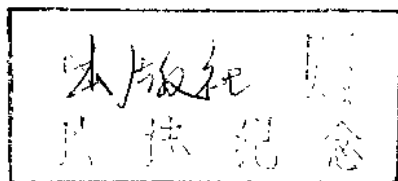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记者通讯员自学丛书
ZGQNJZTXYZXCS



李 昂

杂文与新闻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杂文与新闻

李 昂 著

北京广播学院



杂文与新闻

李 昂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ISBN 7-81004-069-3 / G22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06 110 千字

1988 年 7 月第 1 版 198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500 册 定价 1.75 元

前 言

我国的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广阔领域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到1985年底，全国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已经发展到二千余家，新闻从业人员增加到三十多万人。更为可喜的是，自1983年全国新闻教育座谈会以来，各地出现了兴办新闻教育、竞相学习新闻的热潮。目前，全国已有三十八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在校新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进修生以及函授生不下万人。与此相应，各种形式的新闻干部培训班、新闻刊授学校，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参加学习的人数最多时曾达到二十六万以上，可谓盛况空前。

“新闻热”的形成和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生产愈发展，生活愈提高，信息传播愈广泛愈急迫，新闻事业也愈兴旺发达。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正处在方兴未艾的势头上。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闻爱好者，使整个新闻队伍发生了量的变化——人数增多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份复杂了。无论是从政治思想素质上看，还是从文化业务素质上看，都表现出参差不齐。有的人只有新闻实践经验，而缺乏新闻基础理论；有的人虽有新闻基础理论，而又缺乏新闻实践经验；大多数人是两个方面都缺乏。大家深感远远不能适应今日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学习新闻基础知识，提高新闻业务水平，成了新闻工

作者的一个共同要求，于是“新闻热”应运而生。

我们编写《中国青年记者通讯员自学丛书》的目的，就是想为广大新闻工作者，尤其为青年记者、通讯员以及业余新闻爱好者，提供一点学习新闻的方便。丛书力求系统地、深入浅出地介绍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方面的基本原理和知识以及新闻工作者进行自身修养的途径。同时考虑到作为一个生活在知识急剧更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如果仅仅懂得一点新闻学，而不懂得同新闻学有密切关系的多方面的科学知识，是无法胜任本职工作的。因此还计划介绍一些边缘新闻学方面的知识，如文史哲与新闻、政经法与新闻、自然科技与新闻，等等。我们还考虑到，为了开扩新闻工作者的视野，使其目光投向世界、投向未来，还要适量地介绍国外的一些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经验，以及同新闻传播有密切关系的讯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新技术革命方面的知识。

在现实生活中，事与愿违的事情是常有的。尽管我们想把这套丛书编好，但是苦于自身基础不厚，学识有限，丛书从形式到内容难免有疏漏之处。如果丛书既能给读者一点帮助，又能得到读者的热忱批评，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中国青年记者通讯员自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6年春

目 录

第一章 杂文与新闻的关系 (1)

第一节 大多数杂文都是发表在“新闻纸”上的 (6)

第二节 报纸上的新闻是杂文的主要信息源之一 ... (9)

第三节 不少杂文作者都是新闻工作者 (13)

第二章 为什么要懂一点杂文 (18)

第一节 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理论和政策水平 (18)

第二节 有利于丰富我们各方面的学识 (22)

第三节 有利于改变我们新闻写作上的呆板格式 ... (26)

第三章 怎样阅读和习作杂文 (31)

第一节 学习杂文的选题 (31)

第二节 学习杂文的标题 (40)

第三节 学习杂文的取而精 (50)

第四节 学习杂文的结构 (59)

第五节 学习杂文的议论说理 (69)

第六节 学习杂文的形象描绘 (78)

第七节 学习杂文的抒情色彩 (87)

第八节 学习杂文的幽默风趣 (97)

第九节 学习杂文的语言风格	(107)
---------------------	-------

第十节 学习杂文家的品德、学识和生活	(117)
--------------------------	-------

附：作者杂文十九篇目录

不痴难成才	(127)
风雨之夜的遐思	(129)
当今岳母	(131)
含羞草的品格	(133)
一家不圆万家圆	(135)
天天要吃饭 天天要()()	(137)
党·母亲·春晖	(139)
吃苦·负重·涉远	(141)
英雄树的风格	(143)
归心·铁心·热心	(146)
谓学不暇者 虽暇亦不能学	(148)
为北京争光	(150)
朝气	(152)
苔藓和绿叶	(153)
看看听听无妨吗?	(155)
发出更多的光	(157)
写给“口哨家”们	(159)
消除噪音	(160)
莫让司马懿上当	(161)

第一章 杂文与新闻的关系

“屈指算来，学写杂文已有二十多年了（是时断时续的二十多年）。到如今，我对杂文，是心存挚爱，难舍难分。妻子儿女都知道，一旦我写出了一篇自感得意的杂文，那全家人的情绪都会因我情绪的欢快而变得愉悦；反之呢？大女儿便会悄悄地警告小儿子：‘小心点儿，爸爸今天心情不好！’也曾有朋友问我：‘你心目中最大的不幸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不能再写杂文。’奇怪吗？至今仍被文坛内外不少人小觑的杂文，竟然对我有着这样神奇的魅力。”

这是中年新闻工作者、杂文作家商子雍同志的一片肺腑之言。

开篇引用了这段话，无非是愿这种神奇的魅力，吸引住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让我们不仅对新闻心存挚爱，杂文与我们也难舍难分——新闻与杂文的姻缘本也是难舍难分的呀！这样，或许我们能生发比较浓厚的兴趣，一起来讨论《杂文与新闻的关系》这个题目，进而愿意掌握既能写新闻又能写杂文的两套本领。

什么是新闻？陆定一同志为新闻下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什么是杂文？《辞海》中的解释是：“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文。”从总的方面说，杂文是文学体裁之一，是散文的一种。我看，现在报纸上发表的某些杂文，既然是一种报纸文体，也未尝不可算为新闻体裁之一。它以短小、活泼、锋利、隽永为特点，是一种富有战斗

性的文体。它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的事态变化，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的杂感、杂谈、杂论、随笔，都可归于这一类。

杂文在中国古已有之，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就多有这一类的文章。有人认为，说得广泛一些，孔夫子的《论语》也得叫杂文，因为他天上、地下、礼、乐、射、御、书、数都讲，杂得很，又有文采。当代杰出杂文家绂弩则认为，不仅庄周的《齐物论》、《秋水》，韩非的《说难》、《孤愤》，王充的《论衡》，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黔之驴》，是杂文；连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这样的名诗，连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到杜牧的《阿房宫赋》，以致于欧阳修的《秋声赋》，苏东坡的《赤壁赋》这些名赋，也都是杂文。由此可见，摊开我国的历史文集，其中许多名文，往往就是杂文。《古文观止》撰辑的上起先秦，下迄汉魏六朝，唐宋八大家，以及宋元明朝的两百多篇名文，其中许多都堪称杂文佳作。再比如，《史记》中每一篇本记、列传，最后都附一段“太史公曰”，短短百多字，或歌颂，或贬抑，或寓贬于褒，或寓褒于贬，言简意远，文采斐然，这都可归入杂文的一种。

据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杂文的雏形是“随感录”。“随感录”诞生在新文化运动中。1918年4月，为适应宣传新思想、推广新语体的需要，《新青年》杂志开辟了“随感录”专栏，登载短篇的兼具新闻性和政治性的时事评论，但并非正规的宏制，故曰“随感录”。在《新青年》的影响和带动下，五四时期的进步刊物竞相辟栏，皆曰“随感录”，一时蔚然成风，如著名刊物《每周评论》、《新生活》、《新社会》、《觉悟

(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民国日报副刊)》等，都是“随感录”的生长园地。除此之外，很多刊物也登载与“随感录”名异实同的短论文章，如“杂文”、“杂谭”、“杂感”、“杂评”、“杂著”、“随想”、“随想录”、“乱谈”、“浪漫谈”、“小言”、“批评”、“闲谈”、“补白”之类。它们实际上同属于“随感录”系统，这个时期的“随感录”和“杂感”等并无统一格式，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或有题或无题，或以序号代题。其一般的文体特征在于，“随感录”等是一种时事评论，兼具新闻性和政治性，尚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杂文——文艺性社会评论，虽然少数作者的少数作品已称得上是杂文中的上品。随着时间的推移，“随感录”之类的短论在发展中分衍为两大支脉：一是一如既往的时事评论；一是文艺性的社会评论——杂文。除此之外，还有小的支流，如向抒情散文和格言隽语演变的趋向。可见，虽然早期的“随感录”尚非真正的杂文，虽然后来的许多“随感录”仍属时事评论，但是重要事实是，“随感录”是现代杂文的胚胎，严格意义上的杂文的定型、成熟和发展，以此为基胎。

从早期的“杂感录”分衍成严格意义上的杂文发展的一大支脉，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也包括一些新文化战士和爱国主义者，正是由他们不断发表的“杂感”作品的风格，逐渐形成了一种“规范化的杂文文体”。所以，在瞿秋白同志写的《鲁迅杂感集序言》里，确称杂感为杂文，确称杂文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因此，杂感这种文体，正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社会论文（阜利通），即杂文。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为了战斗的需要，对于反动、落后和有害的事物，揭微显隐，痛下针砭，

广泛地运用了杂文，使杂文在文坛上成为一支光彩夺目的独立的文学支流。

在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杂文，被人们称之为当代杂文，或新时代的杂文。这个时期，革命作家的杂文大都继承了战斗杂文的传统，对新生的进步的事物给以热情支持和歌颂，对落后的有害事物给以讽刺和抨击，成为新型的文艺政论。如果从1942年延安整风中《解放日报》副刊改版（以谢觉哉同志化名焕南写的《一得书》专栏杂文为其代表）算起，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其中撇开十年动乱时期的杂文应该另当别论外，也有三十多年了。新时代杂文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它犹如钱塘江的大波大浪，几起几落，势虽多变，却奔涌而进。有人把建国后的发展趋势概括为三次大的起落，即从1956年7月到1957年6月为第一次大的起落；从1957年6月到1959年底为第二次大的起落；从1960年到1966年开始十年动乱为第三次大的起落。痛定思痛，这三次大的起落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思考。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广开言路，新时代的杂文出现一次大的解放和兴起，如果和以前的三次大的起落联系起来看，可以称为第四次大的兴起。各种报刊发表的杂文，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和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的时期。《新杂文集》（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所收入的杂文，多是我国进入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之后的新作，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映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风貌，也显示了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新景象。这种新的繁荣景象的特点，正如《新

杂文集·序》中所概括的：题材比较广泛，内容比较丰富，它既讴歌了新时期开拓者的新思想，又针砭了因循保守的旧观念；既赞颂了兢兢业业工作的实干家，又抨击了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既倡导了适应四化需要、利国利民的新风尚，又揭露了危及社会、误国害民的不正之风。在表现方法和写作手法上，又不同程度地显示了新时期新杂文的新风格。作为一个热爱杂文的新闻工作者（包括广大的从事业余新闻报道工作的通讯员），生活在当前杂文兴起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不是理所当然地应该为它的更加繁荣作出贡献吗？

杂文和新闻的关系，从在近代报纸的地位上看，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或者说情同手足。它们相依相生，相辅相成。有人说报纸是杂文的摇篮，杂文是报纸的眼睛。无报纸，杂文几无立足之地，无杂文，报纸便会失去神韵，的确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打开一张报纸翻看一下，除了大量的新闻、通讯、文章和图片外，在副刊或其它版上，总有用醒目的楷体字排印的短文，这大都属于杂文。反正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浏览报纸的四个版（包括六个版、八个版的），发现缺少了这种文体，就象一张漂亮的方桌被砍掉一个角那样，总感到是一种缺陷，从而不胜惋惜！

新闻和杂文，从我国比较早的封建官报上来看，也可以说已是“如影随形”了。根据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历代封建官报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皇帝的起居言行和皇室的动态（封建社会时期，皇帝的左右经常有左右史、起居舍人、起居郎等官员，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包括皇帝的重要讲话以及召封、朝觐、祭祀、狩猎、婚葬、封禅、立储、议谥、赏赐等活动，被记录下来以后，除了宣付史馆外，也

择要在官报上发表)。二、封建朝廷的重大决策，政府会议的公报，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名义发布的朝旨、书诏和法令等等。三、关于封建政府官员的升黜、任免、选拔、赏恤、褒奖、贬斥等类的消息。四、大小臣工的章奏疏表，中央各部院寺监司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报告，各地驻军的战报，言官和其它政府官员对朝廷政事的规谏和建议，宰辅大臣和皇帝在有关章奏上签注的意见和批语等。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前三个方面主要是说的消息（新闻），而最后一个方面，即大小臣工的章奏疏表，特别是言官和其他政府官员对朝廷政事的规谏和建议，其中文采斐然者，便堪称为杂文。当然，古代的封建官报，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喉舌，一千多年来一直对人民进行着欺骗宣传。它所刊载的尽管都是经过筛选、歪曲、美化或夸饰了的官样文章，但是从文章体裁、形式上来看，已经是新闻与评论（包括杂文）共据版面了。可见，杂文和新闻，从报纸一出现，就开始在版面上寻求“联袂”，发展到今天，已是越来越密不可分。

具体来说，杂文和新闻的关系，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多数杂文都是发表在“新闻纸”上的；二是报纸上的新闻是杂文的主要信息源之一；三是不少杂文作者都是新闻工作者。

第一节 大多数杂文都是发表在“新闻纸”上的

“新闻纸”上有杂文的位置，杂文是“新闻纸”特别是副刊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只要翻看一下许多有名的杂文集，就可以发现其中选辑的大多数或者全部杂文，都是在报纸上发表的。据《鲁迅年谱》记载，鲁迅一直重视利用“新闻纸”这个舆论阵地“呐喊”，他的许多有影响的杂文也大都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他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杂文，题目是《无题》（见《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遗》），发表在1921年7月8日的《晨报·浪漫栏》里，署名是：风声。这篇杂文的开头便说：“有一个大襟上挂一支自来水笔的记者，来约我做文章，为敷衍他起见，我于是乎要做文章了。”可见那时报纸已比较重视发表杂文而约名人写一些重点稿件了。《晨报副刊》到1924年底止，共发表杂感九百多篇，其中许多著名杂感，正是鲁迅写的，这个副刊也因此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鲁迅于1926年10月15日，编定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并作《〈华盖集续编〉小引》及《〈华盖集续编〉校讫记》（新诗）。《华盖集续编》共三十三篇，除最末一篇《海上通信》作于1927年外，其余全是1926年在北京和厦门的作品。其中在厦门的七篇还被鲁迅称为“华盖集续编的续编”。这些杂文也大都原发表于《国民新报副刊》、《晨报副刊》、《世界日报副刊》等报纸副刊上。另据鲁迅日记所述，1927年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上海和广州发动“四·一二”和“四·一五”政变后，鲁迅于同年5月6日，会晤日本《新闻联合社》记者山上正义。在谈话中，鲁迅指着窗外高喊“清党”口号的右派工会纠察队，对山上正义说：“真是无耻！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过了五天后的5月11日，鲁迅的杂文《老调子已经唱完》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同时发表的有鲁

迅致这个副刊主编孙伏园的信。信中讲述了自己到香港讲演的经过以及对广州的观感，指出“四·一五”政变后的广州，“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实际上，这是斥责国民党反动派同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以上这些记述，也是鲁迅重视利用报纸和新闻工作者发表杂文和杂感的有力佐证。之后，鲁迅的一些杂文，又相继在广州的《民国日报》等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当时，一些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杂文或其它文章，也多在报纸上发表。如“四·一五”政变后，广州和香港的《循环日报》、《工商日报》等，便开始登载文章对鲁迅进行造谣中伤。对报纸上充斥种种谬论的杂文，鲁迅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地运用杂文予以回击。如1929年7月29日，鲁迅所作杂文《〈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就是对7月26日《新闻报》刊登的清癯所作《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一文的尖锐回击，批判了当时刚欲兴起的“民族主义文学”逆流，驳斥了多年来西方资产阶级统治者所宣扬的“黄祸论”，对清癯等人为代表的鼓吹“征服”“赤俄”的论调给以痛驳。鲁迅后期的杂文，大部分发表在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上。他有两本杂文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几乎都是刊登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的作品。

再拿国外来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列宁杂文集》，辑录了列宁在各个革命斗争时期所写的短文八十六篇，其中大部分是每篇一二千字的杂文。这些杂文，绝大多数是发表在苏联《火星报》、《无产者报》、《真理报》、《前进报》、《工人报》等报纸上的。据说，西方报纸也多开辟有类似杂文文体的专栏。

就我国当前报纸改革的发展情况看，大量的杂文更是在报纸上发表的。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包括地区、县以及一些厂矿企业办的报纸（日报、晚报）副刊上，可以说没有不发表的杂文的。许多报纸的一版、理论版、党团生活版、以及其它专版，也都常有杂文出现。如《人民日报》一版开辟的《今日谈》专栏，《解放军报》一版开辟的《集思广益》专栏，《北京日报》一版开辟的《文明小议》专栏，……里面所发表的短论，都可称为“小杂文”。包括《人民日报》在其它版上，以石角为笔名发表的一些短文，被叫做“社会杂文”。报纸上陆续发表的杂文，不少都被汇辑成书出版。如大家熟知的杂文集：《长短录》和《燕山夜话》，就主要是选辑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和邓拓等同志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上发表的杂文。不久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出版的两本杂文集：《不惑集》和《纵横集》，共辑入了三百五十多篇杂文，全部是近几年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最近，出版的一些杂文家的杂文集，如冯英子的《相照集》、林放的《未晚集》、舒展的《辣味集》、牧惠的《湖滨拾翠》，其中收入的杂文也大都是在报纸上发表的。

第二节 报纸上的新闻是杂文创作的主要信息源之一

许多杂文家、杂文作者都是每日报纸的忠实读者，他们往往是看了报纸登载的某一篇新闻、通讯、文章、甚至照片、图画，有所感触，有所思索，便写成杂文。

杂文是战斗性文体，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这就决定了杂文须和社会现实的脉搏息息相通，紧紧伴随社会前进的脚步，以敏捷的速度，鲜明的风格，简要而犀利地表达人们的见解，揭示和推动事物发展的进程。这就是说，杂文和社会的变革动向应该有着最直接与最迅速的结合；而新闻又是天天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把人民的各方面的意见和活动，及时准确地加以传播。这样，新闻自然就成了杂文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主要信息来源。所以说，一个经常写杂文的作者和报纸的联系，真如形影相随，须臾难离。如果一个杂文作者不订报，不看报，闭目塞听，恐怕就轮到“笔枯水竭”了。据说，当年鲁迅在上海的时候，就订阅了两份报纸：《申报》和《大晚报》。他那时写的杂文，不少就取材于这些报纸上发表的新闻。

如1933年5月9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中的杂文《不负责任的坦克车》，开头便是引用报纸上新近发表的新闻事实：“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

再如1933年5月17日写的杂文《保留》，开头则是综合引用几天来报纸上发表的新闻，叙述和剖析一个完整的事件：“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注：名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社电》的音译）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云……”